

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与高质量走出去策略*

文东伟 肖丽 刘品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在全球供应链加速区域化重构、国内产业竞争加剧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中国重塑产业竞争优势和促进区域经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围绕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演进趋势、结构特征及制约因素,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利用FDI-Markets数据库中的2004—2024年企业投资数据,从投资规模、目的国分布、来源城市、区域差异和行业结构等维度进行统计比较与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广东省对东盟投资呈现长期增长与阶段性波动并存的特征,投资范围由少数国家逐步拓展至东盟多数国家;第二,投资来源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深圳、广州形成双核驱动格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第三,行业投资高度集中于制造业中的电子信息、新能源和高端装备等产业。第四,广东省对东盟投资受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分化、制度差异、大国博弈外溢、跨境金融供需错位、复合型人才不足及绿色合规成本上升等因素制约。为此,应引导企业实施差异化、高端化投资策略,强化风险评估,完善政府支持和加强人才保障,推动广东省对东盟投资向更高韧性、更优结构和更深层次区域融合转型。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 东盟 广东省 对外直接投资 高质量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5-0030-14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受贸易保护主义、技术民族主义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供应链体系开启新一轮收缩重组,在布局上愈发呈现友岸化和区域化的特征。跨国企业深刻意识到跨区域长链条供应链的脆弱性,“缩短供应链半径”“贴近核

心市场”成为企业规避风险的共识,推动供应链向地理邻近、政治关系友好的区域集中。中国与东盟10国山水相连、陆海相通,环绕南海形成了紧密的地理共同体,且中国华南沿海港口群与东盟主要港口构成了全球最密集的区域航运网络之一。在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与东盟的地理邻近性成为双方深度参与区域分工、共建供应链网络的重要支撑。广东省作为中国

收稿日期:2026-05-14;修回日期:2026-07-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一轮数字创新重塑中国对外贸易新发展格局研究”(23AJY025);南开大学文科发展基金一般项目“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国际贸易发展新格局的影响研究”(ZB22BZ0211)

作者简介:文东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肖丽,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研究;刘品妍,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研究。

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地处华南沿海,具有毗邻东盟核心市场的天然近岸优势。其中广州港等至越南海防港、泰国林查班港等东盟主要港口的海运航程仅需3~7天,大幅提升了供应链的流转时效,为广东省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天然的区位优势。^[1]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竞争的“内卷化”趋势也愈发显著,部分行业出现需求增长放缓、供给相对过剩的问题。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企业也陷入了非理性、低水平的恶性价格竞争,导致整体市场利润微薄、创新乏力。一个雪上加霜的现实是,国内土地、劳动力、原材料等核心生产要素成本持续攀升,叠加环保约束强化、合规成本增加等因素,企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广东省作为中国产业集聚的核心区域,同样面临“内卷化”的发展困境。一方面,广东省的电子信息、新能源、智能制造等优势产业分布集中,市场饱和度持续提升,且大量企业集中于全球中低端环节布局。另一方面,广东省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劳动、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的问题,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运营成本,也加剧了劳动者的生存压力。广东省正处在一个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高价值发展的关键转型与突围期,面临着“成长阵痛”与“转型压力”并存的两难困境。如何打破内卷,实现新的转型与突破,是广东省经济发展急需完成的重要课题。

值得关注的是,东盟拥有6亿多人口构成的广阔市场及持续扩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未来在电子消费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将会形成旺盛需求,这与广东省优势产业供给能力高度契合,也为广东省企业摆脱国内价格战、开辟新增量提供了新的途径支撑,企业还可依托东盟辐射全球市场,拓宽国际化边界。除前述因素外,东盟部分国家具有明显劳动力优势,且土地租金优势明显。这一成本差距意味着,企业若在这些国家布局生产,其生产端成本能够实现大幅下降。且广东省与东盟地理邻近,近

岸航运物流成本仅为欧美航线的1/3,这将进一步提升资金周转效率,帮助企业重塑成本优势。由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通过与东盟建立深度链接,广东省能更有效地整合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出口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连接点,从而进一步巩固广东作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前沿阵地”的地位。

自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以来,广东省对东盟投资进入了规模扩张、结构优化与布局深化的新阶段。大湾区通过统筹港澳国际化服务优势与广东产业基础,推动规则衔接、金融开放与科技创新协同,为广东企业出海提供了跨境资金池、国际法律与会计服务、供应链金融等全方位支撑,有效降低了企业赴东盟投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缓解了融资约束。同时,大湾区战略推动的“湾区研发+东盟制造”产业分工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广东电子信息、高端制造等产业的梯度转移与区域布局,推动对东盟投资从传统的产能外迁向全产业链协同、价值链延伸升级。在RCEP生效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化的双重红利下,广东省对东盟投资规模持续攀升、国别布局不断拓展,已形成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核心市场与泰国、柬埔寨等新兴市场协同发展的格局。进一步将广东省数据与全国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广东省在全国对东盟投资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按同一年度口径折算,2016—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累计约207.21亿美元,占同期全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约1650.47亿美元的12.55%。^①上述数据表明,广东省在全国南向投资格局中长期保持较高权重,是观察中国地方层面对东盟投资扩张、产业转移和区域合作深化的重要样本。

因此,本文基于FDI-Markets数据库,聚焦广东省对东盟对外直接投资(OFDI)研究,将投资目的地国、来源城市以及行业纳入统一研

^①根据《202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及FDI-Markets数据库整理得到。

究分析,有助于构建和理解在新时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逻辑。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分析了在面临诸如市场饱和、成本攀升、增长乏力等内卷化情境下,企业应当如何依托地理邻近优势开展东盟投资布局,以开辟新增量市场、重塑成本优势和实现高质量突围。本文的研究既能助力广东省企业实现高质量“走出去”,也能为广东省和东盟间的深化合作提供经验证据,实现广东省与东盟共赢发展,为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贡献中国力量。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 文献综述

本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文献紧密相关。现有关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已颇为丰富,大部分文献都是基于OLI范式,从东道国区位优势、双边关系以及企业自身优势三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从东道国区位优势来看:东道国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充裕程度、历史文化背景对企业对外投资都具有重要影响。一般情况下,政治越稳定、法治体系越完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自然资源越丰富以及越具有自我、平等意识的东道国环境,越有利于企业对外投资。^[2-6]但是一些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却发现了独特的现象:中国企业的投资并不总是流向制度环境优越的国家,甚至表现出流向制度风险较高国家的倾向^[7-9],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资源寻求型投资的目的地通常是资源丰裕但制度欠佳的国家^[10-13]。

其次,就双边关系而言:双边制度安排与国别距离因素同样深刻影响着国际直接投资流动。在双边投资协定的研究方面,双边投资协定能够有效弥补东道国制度缺失,从而对跨国投资产生促进作用。^[14-19]双边政治关系方面,研究结果普遍表明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通过降低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产生促进作用。^[20-22]双边距离因素方面,地

理距离是制约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重要因素,地理距离通过增加信息不对称性、信息搜集成本以及提高企业监管难度对企业进行跨国投资产生负面影响。^[23-26]制度距离方面,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差异会增加企业信息搜集、沟通与交流的成本从而对跨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27-29]现有研究对于文化距离的作用并未达成共识,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化距离会导致“外来者劣势”,文化距离的增加导致文化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文化差异越大,企业收集信息、资源获取、交流与沟通、监督与控制的成本都会提升,从而对企业跨国投资产生不利影响。^[30-32]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文化距离会带来“外来者收益”,当母国与东道国文化差异较大时,跨国公司能够享受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好处,进而避免与东道国企业产生正面竞争,有利于母国企业的发展。^[33-35]

最后,企业自身优势方面:企业异质性特征对其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具有决定性影响。第一,在生产效率方面,Melitz开创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奠定了微观分析基础^[36],Helpman等进一步拓展研究发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中等生产率企业选择出口,而低生产率企业仅服务本土市场。^[37]此后,许多学者聚焦中国问题,验证了高生产率企业更有可能进入国际市场的研究结论。^[38-41]第二,融资约束因素方面,既有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会降低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可能性,还制约了海外投资的规模与持续性,增加已进行投资布局的企业退出海外市场的风险。^[42-46]第三,资本密集度方面,研究普遍发现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倾向越强。^[47-49]

(二) 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主要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关。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能够为企业投资提供微观理论基础;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则揭示了产业从粤港澳大湾区向东盟国家流动的理论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能够解释“粤港澳大湾区”作

为经济核心区如何驱动周围区域发展,影响区域间的产业分布与要素流动。

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邓宁(Dunning)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能否进行国际投资是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具备的某种特定优势,这种优势与垄断优势理论中的垄断优势类似。内部化优势是指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不完全,企业将其资产进行内部化而使其特定优势得以维持。区位优势是指东道国在投资环境方面具备的要素禀赋,体现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政府政策等方面。企业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种优势时,才会进行对外投资。^[50]

2.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

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模式”。该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要素。一是梯度,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如高梯度:发达地区;中低梯度:发展中地区)。二是顺次转移:产业会像水流一样,遵循“高梯度地区→低梯度地区”的规律顺次转移。高梯度地区通过不断创新,培育新兴产业,而将成熟、衰退的产业转移到低梯度地区。三是驱动力:转移的主要驱动力是要素成本变化(如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导致原有产业的比较优势丧失。

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新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空间地理和人类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学科,由Krugman^[51]所创建,在研究范式上同时结合了地理因素和经济模型。新经济地理学强调规模经济、运输成本、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在经济学分析中的作用,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昌久(Fujita)、维纳布尔斯(Venables)等著名学者围绕上述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包含区域模型、城市体系

模型及中心—外围模型等在内的理论体系。^[52]它们共同解释了一个地区内部产业聚集的形成机制:通过劳动力要素流动形成工业中心区和农业外围区,该过程的关键在于运输成本的降低。具体而言,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跨区域流动并不是一种无摩擦的经济活动,而是会产生一定运输成本,因此Krugman打破传统的“无运输成本”假定,将运输成本纳入中心—外围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运输成本的下降为要素空间流动提供了可能性,进而引发聚集经济、外部性、规模经济等经济效应。^[51]除此之外,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代表人物Fujita提出了“空间经济学”的概念,Fujita认为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取决于向心力和离心力之间的均衡。向心力是指能促使经济活动集聚的因素,如市场共享、知识溢出、生产关联等。离心力是指造成生产活动分散的因素,如运输成本、要素不可流动性等。^[52]

三、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基于前述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本文使用FDI-Markets数据库,将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置于“企业优势—区位选择—产业转移—空间重组”的综合框架之下展开。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广东省对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现状,FDI-Markets数据库提供了中国企业层面历年来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数据,本文对“广东—东盟”的每一条数据进行了提取,以便后续从来源城市、目的地国以及行业层面展开更为细致的分析。具体而言,投资规模和国别分布主要用于考察东盟国家区位优势对广东企业投资决策的吸引作用;来源城市和区域差异主要用于解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核心经济空间的集聚效应与外溢效应;行业结构则用于揭示广东制造业及相关产业链环节向东盟转移的梯度逻辑。由此,第三部分不仅描述广东省对

东盟投资的数量变化和结构特征,也进一步说明这些特征背后的理论机制。这些特征为后文广东省如何实现高质量“走出去”提供现实基础和依据。

(一) 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现状分析

1. 广东省对东盟及其各国的投资特征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东盟国家在市场规模、要素成本、资源禀赋和区域制度安排方面具有差异化区位优势,进而推动广东企业依据自身技术、管理、供应链和资本优势进行海外布局。由图1可知,2004至2024年间,广东省对东盟的投资总额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波动特征,但整体处于长期上行趋势。2004年的投资数值较低,为0.38亿美元,至2023年飙升至约68.8亿美元,二十年间增长超182倍,凸显了广东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快速增长。整体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增长期(2004—2006年):投资规模快速攀升,2006年达到首个小高峰17.88亿美元。这一阶段的增长主要得益于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早期实施红利,广东企业开始初步布局东盟市场。第二阶段的震荡调整期(2007—2015年):投资波动明显,在2~13亿美元区间反复震荡。2011—2012年出现阶段性低点,或受全球金融危机余波、欧债危机及当时国际投资环境不确定性影响。第三阶段的剧烈波动期(2016—2020年):经历了“暴涨—暴跌—复苏”的剧烈调整。2016年投资猛增至51.35亿美元,随后2017年断崖式下跌至1.97亿美元,2018—2020年在2~11亿美元的低位徘徊,反映了企业在全球供应链调整及贸易摩擦背景下的审慎决策。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广东省对东盟投资在目的国、来源城市以及行业层面的数值差异较大,使用“亿美元”作为各图的单位会弱化这种差距(小额数值直接被压缩为0值),所以在绘制各图形时仍然使用“百万美元”作为统计单位,但各表格所使用的单位均为“亿美元”,具体的数值可以参考相应部分的图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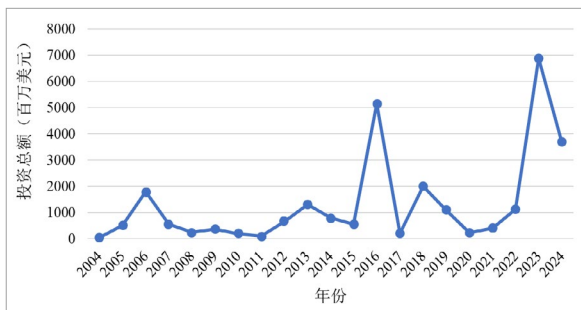


图1 2004—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整体投资总额

图2统计了广东省历年对东盟投资国家的数量变化情况,可以发现的是,2004—2024年间,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国家数量呈现“波动上升、持续扩容”的特征,整体从早期的单点试探发展为全面布局,反映出广东对东盟市场的覆盖广度与深度持续拓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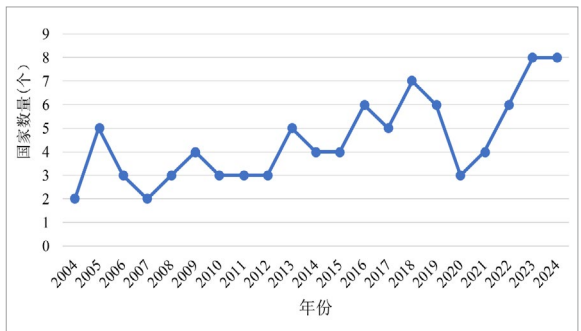


图2 2004—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投资国家数量统计

图1和图2清晰呈现了2004—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整体投资规模与覆盖广度的变化趋势,揭示了广东对东盟投资在总量扩张与区域布局上的阶段性特征。为进一步揭示投资的结构差异,下文将从分国别视角展开细化分析。结合表1的数据来看,2014—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的投资呈现“头部集中、多点开花、后发崛起”的鲜明特征,国别分布的结构差异显著,反映出企业不同市场的战略侧重与产业布局差异。

首先,对于头部市场:印尼、马来西亚、越南为核心投资目的地。从累计投资规模看,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稳居前三,合计占总投资的约75%。其次,对于潜力市场:泰国、柬埔寨等国稳步崛起,投资多元化加速。泰国、柬埔寨、菲律宾等国的投资规模虽不及前三强,但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最后,对于成熟市场:对新

加坡投资平稳,功能定位清晰。新加坡累计投资9.33亿美元,整体规模虽不算顶尖,但保持了连续多年的稳定投资,未出现大额波动。整体来看,2016年和2023年是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两次显著高峰,但其成因有所不同。2016年投资额突增后于2017年迅速回落,说明该高峰具有明显异常波动特征,主要体现为少数大额项目在重点国家集中落地所带来的阶段性冲高,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深化以及广东企业在东盟布局资源加工、基础设施配套和制造业相关项目密切相关,具有较强的项目驱动特征。2023年投资高峰则主要由制造业投资拉动,反映出RCEP生效、全球供应链重构以及广东制造业加快向东盟布局的综合影响。同时,表格中部分年份的零值也反映出早期投资的不稳定性,而后期投资国家数量的增加、投资规模的稳定化,体现出广东企业对东盟市场的布局正从“单点大额”向“多点均衡”转变,区域合作的韧性与深度不断提升。

表1 广东省对东盟各国的投资情况统计(单位:亿美元)

国家\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合计
印度尼西亚	6.17	1.26	20.01	0.07	8.12	0.00	0.00	1.96	0.13	12.53	17.16	67.41
马来西亚	0.58	1.28	23.97	0.93	4.56	0.21	0.00	0.00	0.53	16.07	4.99	53.12
新加坡	0.02	0.82	0.99	0.07	2.70	2.11	0.40	0.63	0.13	0.03	1.45	9.33
越南	1.10	0.00	2.21	0.64	0.61	5.38	1.75	0.03	0.00	30.99	4.46	47.16
泰国	0.00	2.05	0.57	0.27	0.21	1.40	0.15	1.41	4.98	5.67	3.01	19.72
柬埔寨	0.00	0.00	3.60	0.00	0.13	0.90	0.08	0.00	0.00	2.35	5.13	12.11
菲律宾	0.00	0.00	0.00	0.00	3.53	0.00	0.00	0.00	0.07	0.78	0.42	4.80
缅甸	0.00	0.00	0.00	0.00	0.00	0.87	0.00	0.00	0.00	0.40	0.16	1.42
老挝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41	0.00	0.00	5.41
合计	7.87	5.40	51.35	1.97	19.87	10.86	2.30	4.03	11.25	68.80	36.78	220.48

注:数据来源于FDI-Markets。

2.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对“广东—东盟”投资的影响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通过制度开放、金融赋能与产业协同,显著推动了广东对东盟投资。大湾区依托先行先试政策与港澳服务体系降低投资壁垒,借助跨境金融创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同时强化“湾区研发+东盟生产”分工,推动产业链向越南、印尼等国梯度转移,叠加RCEP红利,有效扩大了投资规模并优化了布局结构。

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提出后,广东对东盟投资进入总量扩张与结构优化并行的新阶段,图1、图2以及表1的数据清晰反映了战略红

利的传导效应。从投资规模看,2017年投资总额虽短期回调至低位,但随后快速反弹,2018年回升至近20亿美元,2023年更是飙升至近7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4年虽有回落但仍处高位,整体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从投资广度看,2017年后广东对东盟投资的国家数量持续攀升,2018年达到7个,2023—2024年稳定在8个,基本实现对东盟主要国家的全面覆盖,区域多元化布局显著加速。分国别数据显示,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成为核心投资目的地,大额投资集中释放,同时泰国、柬埔寨等新兴市场投资稳步增长,形成“头部深耕、多点开花”的格局。该投资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大湾区战略的支撑:通过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跨境金融赋能,叠加“湾区研发+东盟制造”的产业分工体系,企业出海成本降低、渠道拓宽,叠加RCEP红利,推动广东对东盟投资规模跃升、结构持续优化。

(二) 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与趋势分析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并非均质展开,而是受产业集聚、市场可达性、运输成本、金融服务和信息网络等因素共同影响。相较于广东省其他区域,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广东省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区域,集聚了资本、技术、港口物流和跨境服务资源,因而更容易形成对东盟投资的核心发源地。基于此,有必要从地级市层面考察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空间差异,以揭示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在跨境投资能力上的分化特征。

1. 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

根据广东省行政区划简表可知,广东省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韶关、河源、梅州、惠州、汕尾、东莞、中山、江门、阳江、湛江、茂名、肇庆、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共21个地级市。基于FDI-Markets数据库,广东省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的地级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湛江和肇庆,计算2004年至2024年广东省各个地级市对东盟的逐年投资水平,绘制表2。

表2 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逐年投资水平（单位：亿美元）

年份	广州	深圳	珠海	汕头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湛江	肇庆
2004	0.00	0.19	0.00	0.00	0.00	0.18	0.00	0.00	0.00	0.00	0.00
2005	0.00	4.73	0.00	0.00	0.00	0.32	0.00	0.00	0.00	0.00	0.00
2006	17.50	0.10	0.03	0.00	0.2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7	5.48	0.0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8	0.00	2.09	0.00	0.00	0.17	0.09	0.00	0.00	0.00	0.00	0.00
2009	3.00	0.71	0.00	0.0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0	0.12	1.6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1	0.00	0.9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2	0.00	0.20	0.13	0.00	6.01	0.00	0.00	0.14	0.00	0.00	0.00
2013	6.08	6.88	0.00	0.00	0.00	0.00	0.04	0.00	0.00	0.00	0.00
2014	6.77	1.1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5	0.00	5.4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6	0.52	28.06	0.00	0.00	18.06	0.00	1.00	0.00	0.00	3.71	0.00
2017	0.00	1.9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8	10.95	8.62	0.00	0.00	0.00	0.30	0.00	0.00	0.00	0.00	0.00
2019	0.65	8.73	0.00	0.00	0.87	0.54	0.08	0.00	0.00	0.00	0.00
2020	0.55	1.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14	0.00	0.00
2021	0.00	3.56	0.00	0.00	0.42	0.00	0.05	0.00	0.00	0.00	0.00
2022	0.00	11.22	0.00	0.00	0.00	0.03	0.00	0.00	0.00	0.00	0.00
2023	6.25	31.64	0.00	0.00	0.00	25.49	3.30	0.42	0.00	0.00	0.00
2024	1.83	22.45	2.37	0.00	2.18	0.03	5.23	0.69	2.00	0.00	1.70

注：数据来源于FDI-Markets。

由表2可知，2004年至2024年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逐年投资水平基本呈现投资主体高度集中、核心城市轮动的特点。具体来看，投资主体高度集中在深圳、广州、佛山、惠州四个地级市，它们是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中心。核心城市轮动表现为深圳与广州交替贡献峰值，在2006年、2007年、2009年、2014年和2018年，广州对东盟投资额为当年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投资额的最大值，而在其余年份，深圳对东盟投资额为当年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投资额的最大值。同时，随着年份的增加，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逐年投资水平多数呈现增长趋势。其中，深圳市2024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相较2004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增加22.26亿美元，增长幅度为11715.79%。值得注意的是，惠州2024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相较2004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减少0.15亿美元，下降幅度为83.33%。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计算2004—2024年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为了直观展示结果，绘制图3，以进行对比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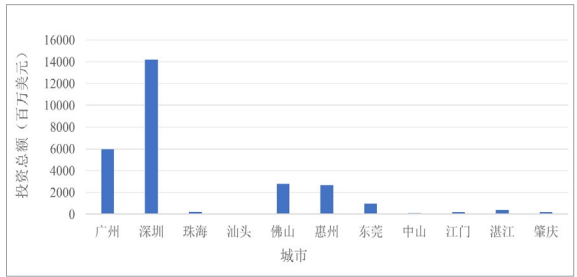


图3 2004—2024年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

由图3可知，2004至2024年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呈现投资高度集聚，城市

断层分化的特征。具体来看，一是深圳、广州双核心领跑。深圳对东盟2004年至2024年直接投资额断层第一，为141.95亿美元，是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最大主力，占广东省对东盟总投资比重的51.13%。广州对东盟2004至2024年直接投资额稳居全省第二位，为59.69亿美元，是广东南向投资的传统门户枢纽，占广东省对东盟总投资比重的21.50%。二是惠州、佛山中坚梯队。惠州、佛山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分别为26.97亿美元、27.96亿美元，分别占广东省对东盟总投资比重的9.71%、10.07%，远高于其余地级市，是制造业产能向东盟梯度转移的主要承载城市。三是其余地级市分散参与，珠海、东莞、中山、江门、湛江、肇庆等地级市累计投资额较低，为21.01亿美元；汕头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为0.01亿美元，整体贡献较弱。

2. 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区域分析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建设，为了研究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的区域特征，将广东省地级市划分为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与非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两个区域，基于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数据，测度两个区域在2004年至2024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对比分析两个区域2004年至2024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其中，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共9个地级市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广东省汕头、韶关、河源、梅州、汕尾、阳江、湛江、茂名、清远、潮州、揭阳、云浮共12个地级市属于非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为了直观显示结果，绘制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与非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折线图，具体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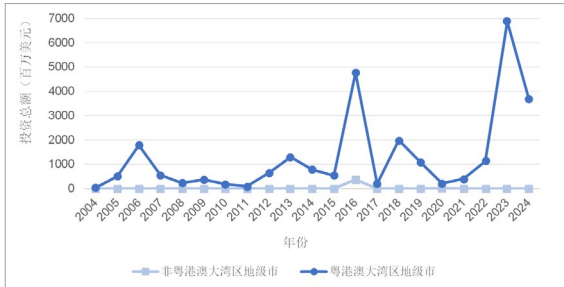


图4 2004—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与非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

由图4可知,广东省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呈现区域分化与趋势波动的特征。具体来看,区域分化体现出投资极端化的特征,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占据绝对主导地位,2004年至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对东盟的投资规模全程远超非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除此之外,2004年至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呈现“强烈波动、阶梯增长”的特点,非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市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呈现“零星投资、平稳发展”的特点。

(三)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行业特征

由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可知,行业结构是判断跨区域产业转移方向和层次的重要维度。随着广东土地、劳动力及环境约束成本上升,部分成熟制造环节和配套产业具有向要素成本较低、市场潜力较大的东盟国家转移的内在动力。因此,有必要从行业维度考察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集中程度与演变趋势,以识别其产业转移特征及价值链重组方向。

1.广东省对东盟国家十大行业投资情况与趋势

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将广东省2004—2024年间对东盟的投资细分为十大行业: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在制表及后续行文时使用阿拉伯数字1-10分别代指上述行业,并依照所述顺序进行赋值:1-制造业,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3-金融业,4-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5-采矿业,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7-房地产业,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9-住宿和餐饮业,10-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由表3数据可得,2004—2024年间,广东省对东盟各行业的投资额整体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与前文所述整体投资趋势一致,故此处不再赘述。

表3 广东省对东盟十大行业历年投资情况统计(单位:亿美元)

年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总计
2004	0.3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38
2005	0.32	0.85	0.48	1.40	2.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5
2006	0.28	0.10	0.00	0.00	17.50	0.00	0.00	0.00	0.00	0.00	17.88
2007	0.07	0.00	0.00	0.00	0.00	5.48	0.00	0.00	0.00	0.00	5.54
2008	0.17	0.18	0.00	0.00	0.00	0.00	2.00	0.00	0.00	0.00	2.34
2009	0.71	0.00	0.00	0.00	0.00	3.00	0.00	0.01	0.00	0.00	3.72
2010	0.12	0.13	0.00	0.00	0.00	1.56	0.00	0.00	0.00	0.00	1.81
2011	0.08	0.33	0.00	0.5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93
2012	0.27	0.20	0.00	0.00	0.00	0.00	6.01	0.00	0.00	0.00	6.48
2013	3.04	3.09	0.31	0.00	0.00	0.56	6.01	0.00	0.00	0.00	13.00
2014	6.98	0.30	0.00	0.00	0.00	0.00	0.58	0.00	0.02	0.00	7.87
2015	2.07	3.3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40
2016	6.06	0.95	0.00	12.11	0.00	0.20	26.00	0.00	6.03	0.00	51.35
2017	0.57	0.57	0.00	0.8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7
2018	2.75	5.90	0.00	0.52	0.00	0.60	1.99	0.00	8.12	0.00	19.87
2019	7.43	1.59	0.46	0.52	0.00	0.00	0.87	0.00	0.00	0.00	10.86
2020	1.28	0.51	0.00	0.5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0
2021	0.73	3.29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2	4.03
2022	5.44	0.40	0.00	0.00	1.48	3.93	0.00	0.00	0.00	0.00	11.25
2023	67.19	1.6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68.80
2024	29.31	6.92	0.00	0.5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6.78
总计	135.24	30.23	1.24	16.95	20.98	15.31	43.46	0.01	14.18	0.02	277.61

注:数据来源于FDI-Markets。

从图5和表3可以看出,广东省在过去20年对东盟十个主要行业的投资总额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制造业(第1类)投资额遥遥领先,总量超过135亿美元,远高于其他九个行业,是广东对东盟投资的核心领域和主导方向。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行业(7-房地产业)投资总额不到制造业的三分之一,排名第三的产业(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总额仅占制造业的五分之一,其他行业如第4、5、6、9类投资规模均明显较小,整体处于中低位。第3类和第10类行业投资额最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结构表明,广东对东盟的投资聚焦度极高,制造业在总体布局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受益于东盟国家拥有丰富劳动力和较低生产成本,与广东成熟的制造体系形成互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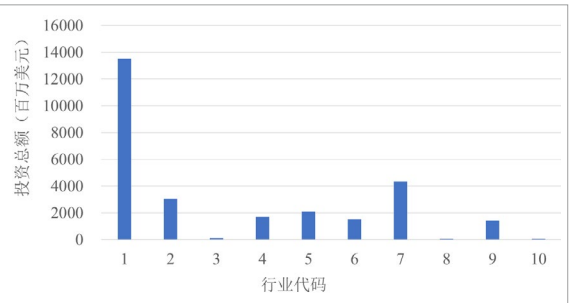


图5 2004—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十大行业投资总额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对东盟国家制造

业的投资情况,呈现总体平稳推进,局部井喷增长的发展趋势。由图6可知,2004年至2021年间,广东省对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投资总额整体保持在较低水平,虽有波动但整体增速较为平缓。2022年开始投资额出现明显上升,到2023年实现了显著跃升,达到67.19亿美元的峰值,投资总额达到近二十年来的峰值,随后2024年略有回落,下降至29.31亿美元,处于井喷式增长后项目落地的建设与消化阶段,但整体投资水平仍远高于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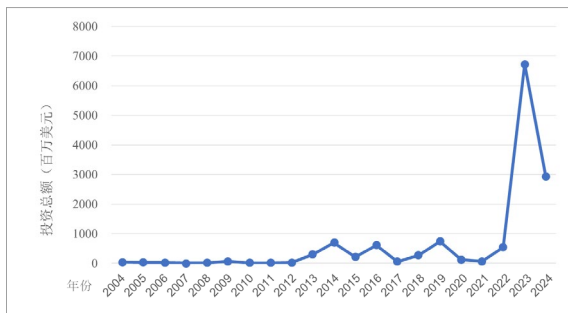


图6 2004—2024年广东省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总额

2. 广东省对东盟十国十大行业投资情况分区域分析

为了研究广东省内各区域的不同投资状况,将广东省内地级市划分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和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进行探究。由于2004—2024年间非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仅涉及对东盟国家制造业的投资,故而在进行区域对比时只选用制造业的投资数据。如图7所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制造业对东盟国家的投资额为131.25亿美元,占比高达97%,而非大湾区城市群制造业投资为3.99亿美元,仅占3%。这种极不均衡的结构,充分体现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广东省对外经济布局中的核心地位与主导作用:一方面立足自身雄厚产业基础,发挥制造业集聚效应,另一方面依托政策引导,RCEP的正式生效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凸显区域战略叠加效应。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广东省对东盟制造业投资的核心驱动力,不仅体现出区域经济实力的集中性,也反映出大湾区建设对全省外向型制造业发展的强力带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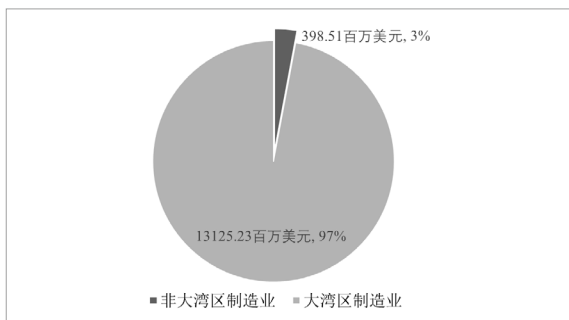


图7 2004—2024年大湾区城市群和非大湾区城市群对东盟制造业投资总额及占比

四、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面临的制约因素与挑战

广东省对东盟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对东盟各国差异认知不足、贸易与投资割裂、出海企业缺乏集群和生态支撑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一) 东盟各国发展差异大,需采取针对性策略

首先是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经济周期不同。由表4可知,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可能对投资项目的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表4 东盟国家实际GDP增速预测值(单位:%)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文莱	1.13	-1.59	-1.63	1.13	4.05	1.80	2.43	2.62	2.87	3.13	2.91
柬埔寨	-3.56	3.09	5.13	5.01	6.02	4.77	4.00	4.54	5.01	5.27	5.51
印度尼西亚	-2.07	3.70	5.31	5.05	5.03	4.86	4.94	4.96	4.96	5.11	5.14
老挝	-0.43	2.06	2.25	3.66	4.30	3.49	2.50	2.50	2.47	2.46	2.46
马来西亚	-5.46	3.31	9.03	3.54	5.11	4.50	4.00	4.00	4.00	4.00	4.00
缅甸	-9.03	-12.00	4.02	1.00	-1.12	-2.68	2.98	2.98	2.51	2.16	1.81
菲律宾	-9.52	5.71	7.58	5.52	5.69	5.43	5.73	5.99	6.00	6.01	6.02
新加坡	-3.81	9.76	4.11	1.82	4.39	2.23	1.82	2.49	2.53	2.48	2.51
泰国	-6.05	1.54	2.63	2.01	2.54	2.00	1.60	2.19	2.31	2.45	2.48
越南	2.87	2.55	8.54	5.07	7.09	6.46	5.59	5.76	5.60	5.30	5.30
东帝汶	-8.49	2.97	3.95	2.38	4.10	3.90	3.30	3.20	3.20	3.20	3.20
东盟五国	-4.42	4.07	5.52	4.07	4.63	4.17	4.09	4.31	4.35	4.46	4.49

注:数据来源于IMF。

东盟并不是一个同质化市场,从增长前景看,东盟内部已逐渐形成“较高增长国家”与“低速增长国家”并存的格局。新加坡、文莱等经济体发展水平较高,市场成熟但增长空间相对有限;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扩张阶段,增长潜力较强;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则处在产业升级与增长动能转换阶段;缅甸、老挝等国家受债务、外汇和基础设施约束,宏观不确定性更高。

企业需要评估自身所处产业的发展周期进

而与不同国家的产业市场相适应,对企业而言,这会增加其市场开拓与布局的难度。具体而言,投资依赖持续现金流回收的长期项目,如新能源基建、跨境数据服务平台、智能物流网络和区域供应链枢纽建设,需考虑到东盟国家经济增速波动可能导致投资回收期被拉长,削弱高技术产业“走出去”的盈利预期和再投资能力。

其次,东盟国家间制度环境与文化结构差异明显,增加了广东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运营风险。制度差异可能通过政策变动影响投资项目收益。东盟部分国家政府更迭后,可能重新调整外资准入、税收优惠、产业补贴、矿产资源开发、土地使用等政策。尤其是广东企业在东盟投资中较多涉及制造业转移、供应链布局 and 园区建设,这类项目通常对土地、用工、物流、关税和地方政府支持政策具有较强依赖,因此更容易受到政策连续性不足的影响。

此外,文化、宗教和民族结构差异也会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东盟国家宗教信仰多元,民族结构复杂,部分地区潜在的民族、宗教矛盾还可能演化为社会治安、罢工、排外情绪甚至恐怖主义风险,威胁企业厂区、人员和供应链安全。

东盟各国经济发展、制度建设与文化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缺乏对各国营商环境、行业政策、法律体系的深度了解,会导致企业重复试错。企业投资时需根据自身产业和东盟市场发展情况采取一国一议、一行业一议的策略,进入成本高。

(二) 贸易与投资割裂,未形成协同效应

首先是标准、检测和认证规则衔接不足,增加了广东企业对东盟投资后的隐性贸易成本。即使广东企业已在某国投资建厂,并不等同于其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东盟其他国家及中国进行直接销售,需要进行重复检测。重复检测会带来检测认证费用与相关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样品运输成本、时间成本、库存成本和通关延误成本。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通过与

包括印度尼西亚数字基础设施总局在内的境外机构合作,采用多机构互认方式实现“一检多证”,使企业认证周期平均缩短60%~70%,综合成本降低50%以上。^[53]该案例说明,智能终端产品出口东盟时,认证差异和重复检测确实会影响企业交付效率和成本控制;反之,若能推动检测结果互认和本地化认证服务,则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次现有政策多集中于贸易或投资单环节,政策工具相对分散,贸易与投资联动支持不足。外贸政策往往侧重出口订单、通关便利和出口信用保险;对外投资政策主要关注境外投资备案、境外经贸合作区、项目服务和境外安全风险提示;金融政策则更多集中在跨境结算、融资便利和汇率避险等方面。虽然这些政策对企业均具有积极作用,但缺乏统一设计和协同衔接,就难以覆盖企业从出口、投资到本地化经营和区域销售的完整链条。

(三) 企业出海缺乏集群和生态支撑

广东企业在东盟的出海模式仍较多体现为单个企业独立开拓市场,缺乏系统化、集群化的海外服务生态支撑,导致企业在进入市场、寻找合作伙伴、开展尽职调查和建立本地化团队时面临较高的信息成本与信任成本。伴随大湾区企业密集出海,东盟市场具备良好政商关系与分销渠道的优质本地合作方资源日益稀缺。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经贸研究与大华银行于2025年开展的联合调查(涵盖600家受访企业),高达47%的大湾区企业将“难以找到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列为在东盟市场的首要挑战,且较往年大幅攀升。^[54]企业在跨越法律体系与商业惯例差异进行尽职调查时,面临极高的信息不对称成本。此外,专业人才结构性短缺同样是生态支撑缺乏的表现。广东企业在东盟投资的产业逐渐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延伸至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光伏储能等领域,对软件开发、数据科学、自动化控制、质量管理、供应链管理 and 高端制造工程师等专业人才需求明显上升。东南亚整体在软件开发、

数据科学、高端制造工程师等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存在巨大的专业技能人才缺口,加剧了外资企业的用工竞争。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战略驱动背景,系统考察广东省对东盟高质量直接投资的时空演进、结构特征与协同路径。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使用FDI-Markets数据库揭示了广东省对东盟投资的现状趋势、制约因素与挑战。研究发现广东省对东盟投资呈现规模跃升、国别多元与高度集中于制造业的显著特征;且区域分化明显,体现为:深圳、广州是对外投资的双核主体,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广东省对东盟投资仍面临东盟内部增长波动与分化、制度一致性低、大国博弈外溢、跨境金融结构性错位、人才支撑不足及绿色合规成本攀升等系统性挑战。据此,本文从企业、政府、行业与社会等层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广东省对东盟投资提出策略建议,以推动广东对东盟投资向更高韧性、更优结构与更深区域融合的方向转型。

第一,关于企业层面的建议。基于东盟各国发展差异大、企业出海缺乏集群和生态支撑等问题,制定针对性策略。

首先,加强东盟各国的国别差异性研究,实施差异化投资策略。企业需建立系统化的东盟投资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投资前深入开展对东道国经济、政治、法律、税务、劳工、环保等方面的尽职调查。运营期间,应建立常态化的合规审查机制,密切关注政策变动,并制定应急预案。同时,加强跨文化管理培训,促进中方员工与本地员工的融合,避免因文化差异引发管理冲突。广东省企业应立足自身在电子信息、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成熟技术与产业链

优势,瞄准东盟市场对智能设备、绿色能源、数字服务等高增长领域的旺盛需求,在投资过程中,企业应注重技术本地化研发与适配,积极参与东盟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提升产品与服务的本地认同度。其次,企业应“组团出海”,形成集群式投资的协同效应。对于产业链较长的制造业,应积极推动广东省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通过共建跨境产业园区、合作区等形式,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例如,在越南或泰国建立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产业园,吸引供应链企业入驻,实现本地化采购与生产协同,降低整体运营成本,增强供应链的韧性与响应速度。此外,加强人才培养,构建复合型团队。企业应通过内部选拔与外部引进相结合,着力培养和储备一批既精通专业技术,又熟悉国际商务规则、东盟市场环境、跨文化沟通的复合型人才。可深化与广东省本地高校(如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及国际商学院的合作,设立定向培养项目;同时,积极招聘具有东盟背景的国际化人才或海外留学生,并建立完善的海外派驻人员激励与保障机制。

第二,关于政府层面的建议。主要针对东盟各国发展差异大,需采取针对性策略和贸易与投资割裂,未形成协同效应展开。

首先,广东省政府应会同商务、金融等部门,研究出台针对东盟不同国别、不同产业的精细化支持政策。对前往越南、泰国等制造基地进行高技术制造投资的企业,可给予设备出口补贴、长期贷款贴息等支持;对在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或区域总部的企业,可提供税收减免、人才安居补贴。其次,重点推动投资便利化、标准互认(如产品认证、数据跨境流动),减少重复检测带来的成本。最后,应在“五外联动”^①框架下进一步推出面向东盟的“贸投联动”政策包,将外贸稳订单、对外投资、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跨境人民币结算、项目融资、汇率避险和法律合规服务进行组合设计。

^①该提法来源于广东省委、省政府,其中“五外”是指外贸、外资、外包、外经、外智,详见: https://www.gd.gov.cn/gdywdt/gdyw/content/post_4664131.html。

第三,关于行业与社会层面的建议。主要针对企业出海缺乏集群和生态支撑展开。首先,应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式出海。行业组织可以推动龙头企业、核心零部件企业、物流企业、检测认证机构和售后服务企业共同进入东盟,形成龙头企业牵引、配套企业跟进、服务机构支撑的出海模式。其次,应建立企业出海风险共治机制。对于重大共性问题,可通过行业组织集中向政府部门、金融机构、驻外机构和东盟当地商协会反馈,推动形成政企协同、行业互助和社会服务共同参与的风险应对机制。

参考文献:

- [1]广州港5条国际新航线接踵而至[EB/OL]. (2020-03-09)[2026-07-16]. https://www.gz.gov.cn/zfjg/gzsgwj/zwlb/content/post_5728156.html?utm_source.
- [2]Asiedu 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 The role of natural resources, market size, government policy,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J]. *The World Economy*, 2006, 29(1): 63-77.
- [3]Busse M, Hefeker C.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 23(2): 397-415.
- [4]余官胜. 东道国金融发展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动机异质性视角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2015(3): 138-145.
- [5]宋利芳, 武皖. 东道国风险、自然资源与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3): 149-162.
- [6]Belgibayeva A, Plekhanov A. Does corruption matter for source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9, 155(3): 487-510.
- [7]Kolstad I, Wiig A. What determines Chinese outward FDI?[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 47(1): 26-34.
- [8]王永钦, 杜巨澜, 王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制度、税负和资源禀赋[J]. *经济研究*, 2014, 49(12): 126-142.
- [9]张建红, 周朝鸿.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以海外收购为例[J]. *经济研究*, 2010(6): 80-91, 119.
- [10]Buckley P J, Clegg L J, Cross A R, et al.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4): 499-518.
- [11]杨娇辉, 王伟, 谭娜. 破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制度风险偏好”之谜[J]. *世界经济*, 2016(11): 3-27.
- [12]Xiao L, Zhao L, Zhu Q. Host country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rade openness and Chinese enterprise overseas investment[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6: 103566.
- [13]Zhang Y, Li Y, Zhang K. The impact of host country institutional quality on OFDI: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 Economic Development*, 2025, 34(3): 527-551.
- [14]Egger P, Pfaffermayr M. Distance, trade and FDI: A Hausman-Taylor SUR approach[J].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04, 19(2): 227-246.
- [15]Neumayer E, Spess L. Do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increa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10): 1567-1585.
- [16]Egger P, Merlo V. The impact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on FDI dynamics[J]. *The World Economy*, 2007, 30(10): 1536-1549.
- [17]宗芳宇, 路江涌, 武常岐. 双边投资协定、制度环境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J]. *经济研究*, 2012(5): 71-82.
- [18]杨宏恩, 孟庆强, 王晶, 等.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基于投资协定异质性的视角[J]. *管理世界*, 2016(4): 24-36.
- [19]邓新明, 许洋. 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制度环境门槛效应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3): 47-55.
- [20]陈岩, 蒋亦伟, 王锐. 产品多元化战略、企业资源异质性与国际化绩效: 对中国2008-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检验[J]. *管理评论*, 2014, 26(12): 131-141.
- [21]潘镇, 金中坤.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J]. *财贸经济*, 2015(6): 85-97.
- [22]Aiyar S, Malacrino D, Presbitero A F. Investing in friends: The role of geopolitical alignment in FDI flows[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4, 83: 102508.
- [23]Ragozzino R. The effects of geographic distance on the foreign acquisition activity of U.S. firms[J].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9, 49(4): 509-535.
- [24]周昕, 牛蕊.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效

- 应——基于面板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J]. 国际经贸探索, 2012(5): 69-81.
- [25]饶华, 朱延福. 效率寻求视角下中国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 亚太经济, 13(6): 86-91.
- [26]Yuan B, Zhang X. Restoring inland prosperity: The impact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land-sea corridor on corporate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egional wealth gap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25, 114: 104135.
- [27]Cezar R, Escobar O R.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4): 713-733.
- [28]王金波.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J]. 亚太经济, 2018(6): 83-90.
- [29]Donnelly R, Purkayastha S, Manolova T S, Edelman L F. Institutional distance, slack resources, and foreign market entr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4, 55(2): 194-211.
- [30]Zaheer S.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2): 341-363.
- [31]杨勇, 梁辰, 胡渊. 文化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 2018(6): 27-40.
- [32]Xu J, Yu Y, Zeng Q.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corporate OFDI: The moderating role of digitalization[J]. *World Academics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24, 12(4): 18-25.
- [33]Shenkar O. Cultural distance revisited: Towards a more rigorous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3): 519-535.
- [34]Evans J, Mavondo F T. Psychic distance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tailing operation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3): 515-532.
- [35]殷华方, 鲁明泓. 文化距离和国际直接投资流向: S型曲线假说[J]. 南方经济, 2011(1): 26-38.
- [36]Melitz M J.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 [37]Helpman E, Melitz M J, Yeaple S R. 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1): 300-316.
- [38]田巍, 余森杰.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 2012(2): 383-408.
- [39]周茂, 陆毅, 陈丽丽. 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管理世界, 2015(11): 70-86.
- [40]蒋冠宏.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J]. 世界经济研究, 2015(8): 37-47.
- [41]Van Biesebroeck J, Zheng H. Export market entry of Chinese SMEs: The role of scale economies and outstanding trade credi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25, 103: 103201.
- [42]Manova K. Credit constraints,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3, 80(2): 711-744.
- [43]王碧珺, 谭语嫣, 余森杰, 等. 融资约束是否抑制了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J]. 世界经济, 2015, 38(12): 54-78.
- [44]刘莉亚等. 融资约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微观视角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 金融研究, 2015(8): 124-140.
- [45]Askenazy P, Caldera A, Gaulier G, et 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foreign market entries or exit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France[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5, 151(2): 231-253.
- [46]Liu Y, Tang T, Li H, Luo L. How do government subsidies affect OFDI of private enterprises?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0: 241-251.
- [47]葛顺奇, 罗伟. 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母公司竞争优势[J]. 管理世界, 2013(6): 28-42.
- [48]金晓梅, 张幼文, 赵瑞丽. 行业要素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 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6): 109-123.
- [49]Li G, Zhang C, Hu L. How ca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ization?[J]. *Sage Open*, 2025, 15(3): 21582440251346204.
- [50]John H. Dunning. Expl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countries: Towards a dynamic or developmental approach[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81, 117: 30-64.
- [51]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483-499.
- [52]空间经济学: 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 梁琦,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 [53]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2025年检测认证“小而美”国际互认合作典型案例[EB/OL]. (2026-

06-10) [2026-07-16]. <https://www.szaicx.com/rzjczx/25422.html>.

[54]Hong Kong: The GBA's ASEAN growth driver-benefits and challenges [EB/OL].(2026-03-30)[2026-07-16]. <https://beltandroad.hktdc.com/en/insights/>

hong-kong-gbas-asean-growth-driver-benefits-and-challenges?ref_source=GrayMenu&ref_medium=BNR.

【责任编辑 苏聪文】

New Trends in Guangdong Province'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and Strategies for High-Quality Overseas Expansion

WEN Dongwei & XIAO Li & LIU Pinyan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accelerating regional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intensifying domestic industri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ntinued advancement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 examin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is of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efforts to reshape its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Focusing on the evolutionary trend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ajor constraints of Guangdong's direct investment in ASEAN, this study draws on the eclectic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industrial gradient transfer theory,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 Using firm-level investment data from the FDI Markets database for the period 2004—2024, it conducts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and an integrated analysis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investment scale, destination-country distribution, source-city distribution,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sectoral composi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irst, Guangdong's investment in ASEAN has exhibited a combination of long-term growth and periodic fluctuations, with its geographical coverage gradually expanding from a limited number of host countries to most ASEAN member states. Second, the sources of investment display pronounced spatial concentration: Shenzhen and Guangzhou have formed a dual-core growth pattern, while citie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occupy an overwhelmingly dominant position. Third, investment is highly concentrated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particularly in such industries 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new energy, and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Fourth, Guangdong's investment in ASEAN is constrained by divergent economic growth trajectories among ASEAN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disparities,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major-power competition, structural mismatches between the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cross-border financial services, shortages of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s, and rising green compliance costs. Accordingly, enterprise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dopt differentiated and higher-value-added investment strategies, strengthen risk assessment, improve government support mechanisms, and enhance talent development,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uangdong's investment in ASEAN toward greater resilience, a more optimized structure, and deeper regional integration.

Key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SEAN; Guangdong Provinc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igh-quality “going global”